

賈涉事功述評

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

黃 寬 重*

摘 要

學界對賈涉列入《宋史》有所爭議，或歸於其次子賈似道當權之故。其實賈涉是在宋金蒙三國勢力交錯、興替時期，以處理邊防、流民及涉外事務表現卓越，才得以列入《宋史》。賈涉的成功，在於他能掌握時勢，適切的執行宋廷的政策鞏固邊防，接納、處理山東忠義軍，利用這批武力成為恢復故土和救援危急的主要力量；進而觀察時勢變動，推動聯結蒙古的外交活動。這些都是他在變動不定的大時代中能出人頭地，晉升高位的因素。忠義軍與李全勢力的發展，對賈涉功業的影響最大。他對忠義軍採取利誘和分化的手段，在初期頗能得心應手，但隨著李全勢力坐大，裂土割據之心轉強之後，使賈涉窮於應付，竟致心力俱疲，顯示他的作法與朝中決策不一致，加上奧援不足，陷於難以掌握時勢的困境。

本文除前言、結論外，分五節討論、評述賈涉的事功，不單純為翻案或補充傳記資料而已，是要將賈涉置於南宋中期對外紛雜情勢的背景來看待，以突顯其角色扮演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以作為瞭解十三世紀中國境內政治社會衝突與融和變化過程的基礎。

關鍵詞：賈涉、淮東制置使、忠義軍、李全、南宋史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一、前言

讀史的人都知道《宋史》是正史中爭議性很高的一部書。《宋史》選錄和敘事的標準，固然引起討論，列傳人物的選擇和事蹟的表達，也常引發後人的批判，賈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賈涉不是宋史上的知名人物。他被世人所知，可能緣自他是被譏為亡國宰相賈似道的父親，而非他的才能；但是，即便知道他的人，對他的處事才能，也多持負面意見，認為將他列入《宋史》顯有過當，且傳文又多溢美，似也是因賈似道當權之故。¹

然而，賈涉的形象並不如以往論史者所述那樣。他由蔭補入仕，能在八年之內由縣令晉升至擔負南宋邊防要務——淮東制置使的高位，除了際遇之外，更需要特殊的能力，才能獲膺此職。而他負責淮東邊務時，正是蒙古崛起，金國衰亡，外在形勢瞬息萬變，南宋和戰政策迭有變化之時。加上華北巨變之後，以李全為首的地方武力相繼興起，與宋金蒙三國勢力相糾結，使得山東淮海地區成為三國勢力角逐、更迭的場域。賈涉雖為宋朝淮東地區的地方官員，卻因處在紛擾多變的環境中，成為第一線的執行者，與大時代變化緊密聯結，甚而影響宋朝的國運。如果能從賈涉所處的內外環境和時局的變化脈絡中加以觀察，應當可以更清楚的掌握賈涉的時代角色和重要性。尤其賈涉本身的資料不多，擴大視野從大環境的轉變背景去了解他的作為，才有可能對他的一生重新賦予客觀的評價。

應當說明的是，本文不是單純的為賈涉翻案或補充傳記資料，而是將他置於南宋中期對外事務紛雜的背景來看待，試圖突顯像他這類型的人物，其角色扮演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以作為瞭解十三世紀中國境內政治社會的衝突與融和變化過程的基礎。不過，由於《宋史》賈涉傳記載他的生平事蹟相當簡略，且擇述的重點和表述方式，都與後世觀點極為不同，反而導致後人多以主觀的立場看待賈涉，甚且以連坐的方式論斷賈氏家族，又不免失之狹

1 孫克寬先生在《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文中的後記中，對賈涉有很嚴厲的批評，認為「窄狹好弄權術，淮東局面正是壞於他手」；而《宋史》本傳對他很恭維，與他的女兒入宮為理宗妃，其子賈似道權傾朝野，致史官對他的傳有所藻飾，見孫氏，《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頁43。

隘、偏頗。² 本文利用的資料，除《宋史》卷 403 賈涉傳、近年來刊布的賈涉墓志、宋史相關人物的傳記與筆記之外，兼及近人研究成果。³ 然而，由於倉促成稿，疏漏必多，敬請指教。

二、賈涉早年事蹟

賈涉（1178-1223）字濟川，天台人。曾祖父文國是一位平民，曾祖母於氏。祖父嗣業，字光濟，性篤厚，隱居讀書，未仕，因涉被贈朝議大夫；祖母於氏。⁴ 父親賈偉，是一名官員，約在淳熙五年至八年間（1178-1181），曾守四川開江（今四川開縣），他目睹雄踞四川的利州西路安撫使吳挺過於驕橫，致書給丞相趙雄揭發其弊端；⁵ 在謁見孝宗時，又奏請裁抑負責鄂州、江陵邊防要務的大將郭杲與郭棣的兵權。⁶ 賈偉的意見雖被孝宗所接受，也先後出任秘書郎、知漢州（今四川廣漢）等官，⁷ 不過，後來吳挺、郭杲等人相繼

- 2 虞允國，《宋光宗、宋寧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第 4 章，因循苟且的十七年，頁 295-297。筆者受孫克寬先生的影響，早年對賈涉亦抱持負面的看法，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84-231。
- 3 筆者多年來對於南宋和戰與流民乃至抗金義軍的議題曾有論著加以探討，其中不少論述與賈涉所處的環境有直接的關係，對瞭解賈涉的生命歷程及評價其得失，有所助益。因此，文中對以往研究南宋中晚期宋金蒙關係的發展及由此引發內外政局的變動，多所引述，作為瞭解賈涉的背景。
- 4 徐規，浙江天台縣發現宋賈涉墓誌，《考古》，1993：12，頁 1145。
- 5 元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03 賈涉傳，頁 12210。參見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時代，《宋史研究集》第 10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頁 276，指趙雄任相是淳熙五年十一月至八年八月，而李昌憲在《宋代安撫使考》（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541-542 指出吳挺當時任利州西路安撫使。任崇岳，《誤國奸臣賈似道》（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一章稱賈涉「看不慣在抗金中立了點戰功，便飛揚跋扈起來的武將吳興，吳興後來當了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剝削無度，魚肉百姓，」，所記「吳興」為「吳挺」之誤，頁 1。
- 6 郭杲與郭棣兩人在《宋史》無傳，但郭杲為南宋中期重要將領之一，紹熙末年曾任殿前都指揮使，寧宗慶元六年任利州西路安撫使。見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頁 542。郭杲曾在淳熙十年任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見《宋史》，卷 176 食貨 上四，頁 4273。賈偉奏論郭杲當在此之後。
- 7 參見《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10；以及 賈涉墓志，見台州地區文化局編，丁俊點校，《台州墓志集錄》（台州：台州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1988），頁 29。任崇岳在《誤國奸臣賈似道》一書中將賈偉稱為「有正義感的武將」，頁 1。傅海波在 賈似道

出任四川、荊襄安撫使等高官，挾怨報復，賈偉受到排擠，含冤而死。⁸

賈涉生於淳熙五年（1178）三月二十八日。早年事蹟不詳，只知他幼年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二十歲時，父親被冤鬱鬱以終。涉獲蔭補的時間不明，但為了洗刷父親冤情，釐清事實，前後費了十年的時間，不辭辛勞，奔走申訴，甚至到宮廷，伏闕上書，終使其父獲得平反。時間約在開禧三年（1207）。賈偉得以平反，大概與賈涉鏗而不捨的精神和才幹出眾有關，但也和宋廷救平吳曦之變，吳璘、吳玠家族在四川的勢力解體，以及郭杲等人不在高位有關係。這時賈涉已三十歲。

賈涉初任高郵縣（今江蘇高郵縣）尉，改萬安縣（今江西萬安縣）丞。嘉定八年（1215），鄰近金境的寶應縣（今江蘇寶應縣）有縣令遺缺，中書省命涉知縣事；涉到任後，感於宋金情勢緊張，恐戰事再啟，為早綢繆，請求築城以固邊。不久，母喪，以憂去。嘉定十年（1217），宋金爆發戰爭，金興兵南犯，攻光州，淮邊告急，宋廷起復賈涉為寶應縣令，這是賈涉實際參與邊防實務，嶄露頭角的開始。賈涉再任寶應縣令，顯然和先前築城有關。自蒙古攻金以來，中原紛亂，宋臣便不斷向朝廷建議罷遣使、團結民兵、築城禦邊。⁹任主管淮東安撫公事的崔與之更積極在淮東沿邊推動築城。¹⁰因此，賈涉的復任當與築城風潮下，崔與之等人的推薦有關。賈涉上任後，除了築城外，又遷縣治還舊基，疏濬望直港，通射陽湖。¹¹不久，改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知盱眙軍等職。

關於賈涉先世的資料不多。從現有的史料看來，賈氏在天台並不是顯赫

個邪惡的亡國丞相？一文中引《宋史》賈涉傳說，賈似道來自一個中級軍官的家庭，賈偉也擔任過低級軍職，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73），頁300。但賈涉墓志指其父曾任秘書郎，知漢州，顯然被視為文官而非武將。

8 《宋史》，卷403 賈涉傳，頁12210。

9 《宋史》，卷395 方信孺傳，頁12061；卷401 樓鑰傳，頁12172。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印行，據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重印），卷168 真公行狀，頁3下-4上。

10 《宋史》，卷406 崔與之傳，頁12258；崔與之，《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臺南縣：莊嚴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13年（1534）唐胄等刻本影印，1996），卷2 言行錄中，稱：「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委官相視」，頁1上。

11 孟毓蘭修，成觀宣等監訂，《重修寶應縣志》（據清道光20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2，頁18上，及卷3，頁1上。

的家族；入仕為文職官員的賈偉，是賈氏起家的人物；賈偉勇於任事，批評時政，雖然獲得孝宗與丞相的賞識，卻因而遭到報復。賈涉的憑藉不多，但為洗刷父冤，奔走陳情，十年不懈，毅力超人，終於恢復其父的名譽。其間，賈涉雖獲任為基層官職，但歷經幾番波折，才得以擔任縣令一職。對一般非由科舉入仕的官員而言，縣令可能已是仕途的高位，然而，由於蒙古南侵、金朝覆亡，山東淮海地區的局勢如波濤洶湧，讓身處邊境、擅於觀察、掌握時勢的賈涉得以一展才華，開創新事業的契機。

三、蒙古南侵下的淮海局勢

十三世紀的中國歷經了由承平到紛亂，由紛亂再回復安定的歷程；其中，由治而亂的鉅變，與宋金間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但促使情勢加劇最重要的催化劑，則是蒙古的興起與南侵。

當宋廷發動開禧北伐，宋、金雙方以兵戎相見之時，成吉思汗則在漠北完成蒙古的統一，正成為金朝的大患。嘉定元年（1208），金章宗逝世，完顏允濟繼位，表面上金朝仍維持著繁榮景象，實則外有蒙、宋兩國的威脅，內則政務日益腐敗，已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嘉定四年（1211）成吉思汗以報父祖世仇為名，聚眾誓師，大舉侵金。七月，蒙古軍相繼擊敗金兵於撫州（今河北張北縣）的烏沙堡及險峻的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境），接著拔宣德，陷德興，取居庸關，進逼中都。¹² 蒙古軍以擄掠為主，攻下城邑後大肆屠殺劫掠，因此兵火所至之處有如廢墟，如中都「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至是）焚毀無遺」；¹³ 華北地區受到兵火侵襲，百姓無以為生，經濟日益衰退，社會秩序面臨崩解。

當時，金廷全力應付蒙古，對國內的控制較為鬆弛，於是在開禧年間曾受到宋人鼓煽興起而暫時潛匿的華北漢人，乘亂再度揭起叛金旗幟，正如《金史》所說：「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飢饉，盜賊蠭起，相為長雄

12 周良霄、顧菊英著，《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38-139。

13 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卷23 東海郡侯下，頁309。

十餘年糜沸未息。」¹⁴ 其中，紅襖軍領袖楊安兒、劉二祖等人，就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此後，金朝內外處境更艱難，華北叛金的武裝活動更為興盛。嘉定六年（1213）八月，當成吉思汗圍攻中都時，金敗將紇石烈執中（胡沙虎）擁兵發動政變，殺死衛紹王允濟，擁世宗孫完顏珣繼位，是為宣宗。這時，蒙古騎兵以浩大聲勢，橫掃黃河以北、太行山東西等廣大地區，使中都成為大海狂濤中的孤島。¹⁵ 宣宗為了避禍，於嘉定七年（1214）五月南遷汴京。成吉思汗以金遷都違約，再度發兵南犯。直至嘉定八年（1215）秋，蒙古軍攻破的城邑就有 862 處，幾乎黃河以北的土地都淪於蒙古鐵騎之下。蒙古兵馬以殺掠為主，鐵騎所到之處，「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¹⁶ 而掠奪之後，蒙古兵隨即離去，致使社會呈現真空狀況，除了部分地區由金朝派官鎮守外，當地土豪、地主乃自相團結，組織武裝力量，以求自保。¹⁷ 於是兩河、山東地區，無論強悍者或狡黠者，莫不掀起叛金活動，史稱：

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¹⁸

這是金統治中原八十餘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山東淮海地區向來是宋金間的主要戰場，在此地的漢人，不論是受到宋廷的鼓勵或出於自發性，其叛金活動久有傳統，辛棄疾就說：「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¹⁹ 蒙古南侵，山東地區戰火燎原，當地的武裝集團再度稱亂，威脅著

14 元 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17，頁 2568。參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頁 175。

15 周良霄、顧菊英著，《元代史》，頁 141-142。

1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景印適園叢書本，1967），乙集，卷 19 韃靼款塞，頁 11 下。

17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頁 176。參見韓儒林主編，《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115-116。

18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6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頁 167。

19 見辛棄疾著、辛啟泰輯、鄧廣銘校補，《稼軒詩文鈔存》（臺北：長安出版社影印，1975），美芹十論，頁 21。參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第 2、3 章。

金朝政權，為此，金廷利用蒙古北撤之際，積極動員兵力，敕平亂事，除掉了紅襖軍領袖楊安兒。但由於金兵處理叛亂的政策失當，騷擾良民，反而引起當地百姓的反感。²⁰此外，自嘉定八年春以來，成吉思汗與拖雷所率領的蒙古軍相繼攻陷濟南、益都、登、萊、沂、密諸州，山東地區因蒙古掠奪戰術的騷擾而滿目荒殘，²¹各地豪傑趁機蜂起，使得叛金勢力更形壯大。這種情況正如《金史》僕散安貞傳所說：「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綿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²²李全適時接替楊安兒所領導的紅襖軍，聲勢倍增，成了山東叛金勢力的主力。

對山東淮海地區的叛金武裝團體而言，存亡與否，視錢糧的取得與資源的開拓而定。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來，山東淮海地區先有紅襖軍的叛亂，接著是金廷平亂兵的騷擾，復有蒙古鐵騎的蹂躪，處處呈現著「賣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的景象，²³糧荒極為嚴重，兩河地區更是「赤地千里，人煙斷絕」。²⁴因而南方的宋朝遂成為武裝集團賴以獲取資源的主要對象，這使山東淮海地區人民競相向南移動，以歸宋為名，尋求宋廷的支援。大量南向的流民，使當時身負兩淮防禦大責的江淮制置使李珣、²⁵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²⁶以及各州縣長官與統軍官，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先是，武鋒軍卒沈鐸和定遠百姓季先知道楊安兒等人有意歸宋，乃說服知楚州應純之加以招納。應純之令沈鐸派人招撫楊友、劉全、李全等人，季先則招徠石珪、葛平、楊德廣等武裝團體，²⁷並鼓勵李全等分兵克復莒、密、青等山東諸地。²⁸應純之眼見李全等人戰績顯著，進而建議邊帥利用這

20 《金史》，卷102 蒙古綱傳，頁2256、2259。

21 周良霄、顧菊英著，《元代史》，第3章，頁141-142。

22 《金史》，卷102 僕散安貞傳，頁2246。

23 《宋史》，卷476 李全傳，頁13818。

24 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卷25，頁345。

25 江淮制置使始於開禧三年二月，由葉適出任，置司建康。見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頁31。

26 見《宋史》，卷406 崔與之傳，頁12258。

27 《宋史》，卷403 賈涉傳，頁12207。

28 此據《宋史》，卷476 李全傳，頁13818-13819。然《金史》，卷108 侯擊傳，則指出金招撫副使黃擱阿魯荅曾破李全於密州，頁2387-2388，則有不同說法。但印證後來侯擊的意見，顯然以 李全傳 的記載較接近事實，頁2388。

些豪傑之士，從事恢復大業。

宋人鑒於蒙古興起與金朝衰敗日益明顯，曾對是否與金和戰的問題展開激辯。²⁹ 雖然宰相史彌遠知道金的國勢受蒙古侵擾而大挫，但開禧北伐的殷鑒不遠，不敢冒然接受主戰者的意見，只是停納歲貢，停派使臣而已，仍謹守和約，如曾封鎖淮水，不准歸正人南渡，甚至將南歸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要求上流制閫之臣，對南來者予以勦殺。³⁰ 然而，山東地區武裝叛金的聲勢浩大，在地方豪強的交通、拉攏下，已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宋廷雖不願光明正大的招納他們，卻密令制置使李珣與知楚州應純之等人接待他們，賦予「忠義軍」的名號，聽從帥臣節制。並依武定軍的例子，提供一萬五千人的軍糧，名為「忠義糧」。³¹ 於是臨近宋境的山東豪傑相繼渡過漣水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嘉定十年（1217），金宣宗對宋宣戰，宋金戰事再啟。金宣宗即位以來，任命主戰的朮虎高琪為相。高琪欲藉擴張疆域以邀功，與高汝礪互相唱和，主張伐宋。宣宗狃於對宋常勝，恥為宋人所輕，加上國用匱乏，謀取賞於宋人；³² 利用蒙古大軍西征的緩衝時間，以南宋歲幣不到及息州饑民作亂為藉口，命右監軍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不統兵分三路南下攻宋。這時，史彌遠以曲在金朝，遂改變政策，請寧宗下詔伐金，並轉而積極招徠歸正北人，成立「忠義軍」。十一年（1218）一月，正式任命歸附的義軍領袖李全為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為京東路鈐轄。³³ 在宋廷與應純之的厚賞與支持下，南下的人絡繹不絕，義軍的抗金活動更形活躍，聲勢日壯，在宋金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9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大文史叢刊》之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8），頁14-19。

30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重印，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5 江東奏論邊事狀，頁23。

31 《宋史》，卷476 李全傳 上，頁13818-13819。

32 林瑞翰，《晚金國情研究》，《大陸雜誌》，16：6-7（1958.3-4）。

33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2 玉牒初草，頁1上。

四、參與邊務、展現才華

當宋金和戰丕變，宋內外形勢變幻之際，正是賈涉直接參與淮東邊務的時刻。在華北流民不斷南移的熱潮中，宋臣不但熱烈討論宋金關係的發展，更發表如何掌握歸正之士的不同意見；而宋廷為因應內外情勢的巨大變化，對於和戰與南下北人的政策也有極大的變化。³⁴ 在時局驟變的時候，賈涉正由寶應縣令轉任淮東提刑，繼而出任淮東制置使，積極地參與沿邊地區的防禦要務。

宋金關係變化的關鍵時期，李珣與崔與之是二位坐鎮南宋淮東防務的重要人物。李動為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是總管邊務、負責屏障京師的重臣，崔與之則是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公事，是負責江北防務的要角。李動與崔與之二人深知宋金關係薄弱，和約難以持久，而且都深感宋朝的邊防相當薄弱，因此積極推動築城固邊的工作。不過，崔與之對招納忠義人的態度，顯然較為保留、審慎；³⁵ 當李全率眾歸宋時，崔與之即指出：「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期望制司善為區處。³⁶ 李動對忠義人的態度則相當積極，他不僅透過應純之等人招納山東忠義人，甚至企圖利用這些人機察敵情，鼓勵李全等人從事恢復故土的事業。³⁷

此外，李、崔二人對金和戰的態度也顯然不同。崔與之強調守禦，李動則積極主戰，圖謀恢復，劉克莊說：「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³⁸ 清楚描述了李動主戰的性格。宋金爆發戰爭前，淮東不斷發生侵擾金境漣水、東海以及圍攻泗州等情事，當與李動的策劃有關。³⁹ 鎮

34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頁14-19。

35 《宋史》，卷406 崔與之傳，頁12258-12259。

36 崔與之，《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1，頁12下-13上。

37 《宋史》，卷476 李全傳，頁13818-13819。

38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36 祭李尚書文，頁4上、下。劉克莊也是主張持重的人，與制置使李珣的意見不同，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94 行述，頁2下。

39 參見《金史》，卷15 宣宗本紀中，「興定元年五月」以後各條，頁330-333。

江都統劉瑋也曾建議蓄養銳氣，以備大舉。⁴⁰ 宋金交戰以後，李動在史彌遠力贊下，於嘉定十一年四月派遣劉瑋率兵由盱眙軍渡淮攻泗州；不意全軍覆沒，金兵乘勝攻入盱眙軍，⁴¹ 建康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⁴² 此時，淮東安撫使崔與之馬上調集各地平時訓練較佳的軍隊，趕往盱眙軍沿淮一帶嚴加守備。⁴³ 他在致史彌遠的書信中，對於邊將的冒進，將使多年來辛苦經營淮東的成果毀於一旦的嚴重後果，感到憂心，他說：「與之乘鄆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⁴⁴ 李動的參議官黃榦也指出「淮上之敗，劉瑋可斬也」，推薦崔與之、方信孺，可惜李動未予採納。⁴⁵ 對泗州戰敗，宋臣有過深刻的檢討，權工部尚書胡榘就指出「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是挑起戰端並導致失敗的原因，而李動則是肇禍的主謀。寧宗也同意此說，認為是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⁴⁶ 所致；轉而傾向和議，⁴⁷ 宋金情勢再變。

宋金推動謀和，卻引起忠義人的疑懼。義軍領袖之一的石珪以宋謀與金和，不利義軍為名，殺楚州都監沈鐸；宋廷為緩和義軍情緒，急罷知楚州應純之，由通判梁丙代理。但宋廷提供的忠義糧不足，梁丙處置無方，石珪率兩萬人渡淮，大掠楚州南渡門。⁴⁸ 面對大批義軍蜂擁南下，邊臣處理失當，

4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76），兵，6之10-11。時為嘉定十年九月。

41 《金史》，卷15 宣宗本紀中，「興定二年一月戊子」，頁334。又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記四月「鎮江忠義統制彭惟城等敗於泗州」，頁3下，當屬一事。關於泗州之敗及李珪招罷的情形，劉克莊在《祭李尚書文》中有深刻的敘述，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33，頁4上。

42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28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頁6上。

43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2，頁2下-3上。《宋史》，卷406 崔與之傳，頁12259。劉瑋在嘉定十年九月任盱眙軍屯駐鎮江都統，見《宋會要輯稿》兵，6之10-11。

44 《宋史》，卷406 崔與之傳，頁12259。

45 《宋史》，卷430 道學四·黃榦傳，頁12980。

46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2，頁6下，嘉定十一年八月癸卯。

47 《宋史》，卷40 寧宗本紀四，寧宗嘉定十一年五月丁亥，「詔侍從、台諫、兩省官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頁770。《金史》，卷15 宣宗本紀中，金廷也於同年十二月命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等使宋講和，頁341。

48 《宋史》，卷403 賈涉傳，頁12207。罷應純之在嘉定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2，頁14下。

幾釀成巨禍，時任知寶應縣令的賈涉上書宋廷，指出若在忠義人不斷南移之際與金謀和，將使山東的亂局蔓延至兩淮；建議宋廷立下固定員額以招安義軍，讓他們自成一軍，安置在淮北，如任其南下，將來難以應付。宋廷乃任命賈涉為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他受命後，親自出面招撫叛兵，穩定局面。⁴⁹

嘉定十二年（1219）春，金人以數十萬人分兵進犯濠、滁等州，並計誘石珪等人。李動遣官兵與忠義軍救援無效，兩淮告急；淮南流民競相渡江避亂，金人游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情勢混亂。⁵⁰ 賈涉擔憂石珪等為金人所用，派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往滁、濠，命李全兄弟襲擊金人歸路，並以傅翼監軍。由於義軍奮勇力戰，相繼解除各地受困的局面。⁵¹ 其中李全兄弟由楚州引兵救援，在渦口擊敗金兵，使金主力全喪，不敢再窺淮東，是保衛兩淮的戰鬥中，具有決定性的戰役。⁵² 為了獎賞忠義軍救援淮東的功蹟，宋廷應賈涉之請，將安邊所沒入寶應縣中原屬韓侂胄的 59 頃田地，撥充忠義人耕種。⁵³

忠義稱亂、邊防告急，緣於守邊重臣不能協力合作所致。宋臣檢討此一情勢，首先奏劾身負邊防重責的制置使李動「敗軍誤國，大罪有三」。⁵⁴ 由於情勢緊迫，宋廷採取緊急應變，一方面罷李動，⁵⁵ 並改任崔與之為秘書少監，將二人調離淮東邊務；一方面罷江淮制置司，另置沿江、淮東、淮西制置司，以加強邊備。⁵⁶ 此時淮邊守臣多屬輕儇浮靡之士，人心不附，制置使與安撫使又同時被調職，使得流言滿道，形勢頗為危急。宋廷鑒於賈涉調遣義軍，解除淮東危急的表現優異，接受殿中侍御史李楠「官序尚卑，資望猶

49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7-12208。又見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0。

50 《宋史》，卷 40 寧宗本紀 四，頁 772。

51 此處係綜合《宋史》，卷 40 寧宗本紀 四，頁 772；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8；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0；《金史》，卷 15 宣宗本紀，頁 324，之記載而成。

52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0。

53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3，頁 8 下，嘉定十二年五月己酉條。

54 《宋會要輯稿》，職官，75 之 33。李楠奏稱「李珪權重謀疏，泗上之役，實珪逼行，損國家威重，啟夷狄卿（疑「輕」字誤）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3，頁 10 下。

55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3，嘉定十二年六月。

56 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15，頁 288。

淺，則姑命以副使」的建議，⁵⁷於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先任命賈涉為淮東制置副使，旋即任為淮東制置司公事；⁵⁸宋廷為了直接掌控沿邊情勢，推動防務，將制置司的任所遷至較近金境的楚州，並將反對遷到楚州的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予以調職。⁵⁹

總之，在宋金和戰丕變，淮東戰況激烈之時，二位擔負淮東邊防重任的大臣，因意見不和、不能協力相助以穩局勢而遭調職。宋廷為鞏固邊防，緊急任命調派義軍解除江淮危機有功的賈涉，出任肩負屏障宋疆的淮東最高官員。從此，賈涉成為在第一線執行邊防與涉外要務的南宋重臣。

五、推動恢復，聯結蒙古

賈涉出任淮東制置使之後，以處理山東忠義軍為重心。自嘉定十年爆發的宋金戰爭，表面上戰火四起，拖延甚久，實際上由於雙方均無必勝之把握與決心，因此在戰爭持續之時，即有謀和之議。對金廷而言，外有蒙古侵犯，內有叛民，加上遷都後衍生出許多社會經濟難題無法解決，而宋邊防尚嚴，難以擴展戰果爭取勝利；金宣宗在朝臣建議下，由武休關進取四川時，說「此舉蓋為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⁶⁰就說明了他的心意，只是礙於情面，又氣憤宋策動忠義軍從中牽制，才相繼發動游擊性的攻擊，並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至於宋廷，自戰爭爆發以來，被動應戰者多，也不願擴大事端；何況自嘉定十二年秋起，淮東忠義軍聲勢壯大，自主性又強，如何加強對這些人的掌控，讓他們發揮積極的戰力，而避免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利用義軍，正是宋廷更為關心，也寄希望於賈涉的重責大任。

山東忠義軍是特定時空下產生的複合體。「忠義軍」為宋廷賦予的一個通號，實際上是由無數個在宋廷招撫下，掀起叛金或投宋而各自擁有武裝力

57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3，頁 10 下，嘉定十二年六月癸未。

58 時賈涉為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見《宋會要輯稿》，職官，40 之 19。而於同年九月正式出任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見《宋史》，卷 40 寧宗本紀 四，頁 773，及《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 15，頁 289。

59 事在嘉定十二年十月辛卯，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3，頁 15 上。

60 《金史》，卷 15 宣宗本紀 中，「興定三年二月庚戌」，頁 343。

量所組成的團體。雖以歸宋為名，其中真心歸宋、深明民族大義者不多，多半是在戰亂、飢荒中，為求生存或圖利，而揭起擁宋的旗幟，實質目的是為了獲取財物與糧食。這些人勇武好鬥，熟悉華北地理情勢，可以作為宋廷恢復故土的先鋒，但人多勢散，如何組織人力與支應財糧，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嘉定十一年，石珪在南渡門焚掠後，賈涉所提「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⁶¹的意見，當成為他爾後處理忠義人的基本原則。但在時勢的推移下，仍有所變化，從言論及以後作為看來，賈涉顯然比較彈性的執行李動的政策。

宋金戰爭以來，淮東積極招徠忠義軍。宋廷先依武定軍例，放錢糧一萬五千人，人數激增之後，又增放二萬人錢糧作為號召，時青、石珪、彭義斌、嚴實、夏全等人紛紛歸正。其中嘉定十二年六月，金青州守臣益都人張林在李全的勸說下，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州歸宋，表稱「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次年，嚴實也應趙拱之召，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州來歸，使太行山以東之地，名義上復歸宋的版圖。⁶²

賈涉進一步鼓勵義軍北伐。他銜宋廷之命，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來激勵豪傑。於是，忠義軍的恢復行動更為頻繁，李全揮兵北上，爭衡中原，難怪金人要說「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⁶³彭義斌一軍更侵河北，取大名、中山，破東平，下真定，迨西山，懸師北伐，號召兩河豪傑，重樹大宋旌旗，兵威之盛，竟使山東的蒙古漢軍「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⁶⁴這麼豐碩的戰果，不僅使宋廷博得興復山河的美名，義軍也獲得了高官厚爵：張林被封為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李全改為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⁶⁵職司統禦義軍大責的賈涉也被擢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

61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7。

62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0-13821。

63 《金史》，卷 118 苗道潤傳，頁 2574。

64 姚燧，《牧庵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8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頁 175。參見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中華書局，1968），頁 74。

65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0。

制。⁶⁶

在賈涉的節制下，忠義軍積極參與解除淮西之圍的軍事行動。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再謀伐宋，以十餘萬犯光州、圍黃州，分兵破淮西諸縣；淮西守備薄弱，帥臣趙善湘請援於朝廷。宋廷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⁶⁷ 賈涉遣李全、彭義斌、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及徐暉等分別率忠義民兵與正規軍救援黃、蘄。三月，淮東兵未至，黃州已被攻破，蘄州亦因徐暉援救不力而告陷落。⁶⁸ 李全趕至，護安慶，與趙范、趙葵兄弟協力救黃州，並遣彭義斌掩襲淮上金兵。⁶⁹ 山東忠義軍的協力合作，迫使金人退師。⁷⁰ 在淮東兵馬從事救援淮西的行動中，賈涉發現徐暉護城無功，率先逃遁，將他斬首示眾，從而穩固淮西局勢。由於賈涉籌劃、指揮、策援有功，宋廷乃遷之為權吏部侍郎；⁷¹ 七月，他更被任命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⁷² 這是賈涉地位與聲望最高的時候。

賈涉在策動義軍北伐與救援的同時，也推動聯結蒙古的工作。這一項涉外行動，除攸關宋蒙結盟外，交涉山東忠義人的問題，殆為重要因素之一。當山東地區成為宋金蒙三國逐鹿的主戰場之後，夾在三國紛爭中的義軍，就出現複雜化的傾向；尤其是蒙古在河朔、山東等地停止殺戮，轉而積極爭取據地自保的豪傑，⁷³ 以及金廷改剿為撫，不惜以名器爭取山東武裝勢力以後，宋金蒙三方勢力交相爭取這些武裝團體，使得一向活躍於山東地區而以歸附宋朝為主的武裝力量，在依從的態度上有了變化，游移於三國之間，或叛或降。這也使得宋蒙的交涉中，多了一項討論的議題。

此前，嘉定二年二月，宋廷得知成吉思汗南侵的消息時，僅由執政者「作私書密諭諸軍帥臣」在邊境進行戒備，態度相當謹慎。⁷⁴ 到嘉定四年，宋

66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8。

67 《宋史》，卷 40 寧宗本紀 四，「嘉定十四年二月甲申」條，頁 776。

68 見黃寬重，南宋茶商武力的發展：內亂與禦侮，《宋史研究集》，第 20 輯，頁 352。

69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8-12209。

70 同註 63。

71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9。

72 《宋史》，卷 40 寧宗本紀 四，頁 777。

73 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頁 47-54。

74 《宋會要輯稿》，兵，29 之 47。陳高華，早期宋蒙關係和「端平入洛」之役，《宋遼金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1 輯，頁 47。

使余巖回報蒙古圍攻燕京的消息後，宋人開始關切並討論如何聯合新興勢力以復世仇。⁷⁵等到木華黎擔負主導伐金的軍事任務後，為了加速金的滅亡，減少後顧之憂，曾於嘉定七年（1214）一月派三位蒙古使者渡淮到濠州鍾離縣，圖謀聯宋。當地守臣以「不奉朝旨，不敢受」為辭加以拒絕。⁷⁶不過，蒙古與金朝國力消長至為明顯，宋臣進一步討論如何對待蒙古的問題。嘉定八、九年間，與宰相史彌遠素有親密關係的程秘，向宋廷提出在朝廷的默許下，聽由邊閫進行聯蒙恢復的方案，他說：「強敵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為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⁷⁷

程秘的意見，對宋廷乃至賈涉在淮東推動的聯結蒙古，具有重要的影響。嘉定十年，宋金爆發戰爭之後，宋臣有「獻策北通韃靼」之議。⁷⁸不過由於忠義軍在蒙宋間叛服無定，引起雙方的誤會，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蒙古曾於嘉定十一年派葛不罕與宋議和，可能談到夾攻的事，⁷⁹宋也派苟夢玉出使蒙古。⁸⁰此時，或許由於宋廷對聯蒙夾攻金朝的態度不太熱衷，雙方沒有進一步協議的跡象；但嘉定十三年十二月，義軍領袖石珪叛宋投蒙的舉動，引起宋廷的重視，賈涉顯然是在史彌遠同意下，派都統司計議官趙拱經由河北、山東到蒙古軍前議事。趙拱會見了木華黎，雙方直接溝通，蒙古大將並贈北宋舊物「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方，由賈涉轉呈宋廷。⁸¹到嘉定十五年（1222），宋臣魏了翁擔心宋與金相抗之時，蒙古與西夏將有窺伺邊境，為了穩定局勢，建議朝廷「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使群盜無以措其碁間之辭」，⁸²此一交涉內容可能與山東忠義軍有關，但紀錄不詳。此時，賈涉在應付李全引發的一連串事情上，可能已精疲力竭，並無餘

75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第2章，頁24-27。

7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9 韃靼款塞，頁9上、下。

77 《洛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 邊幣議，頁7-8。按「強敵」二字嘉靖本作「韃靼」，應是。

78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28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頁7上。

79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第2章，頁28。

80 《元史》，卷1 太祖本紀，頁23。陳高華，早期宋蒙關係和「端平入洛」之役，頁49。

81 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卷19 嘉定寶璽，頁346。

82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16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及韃事，頁146。

力再推動此一外交活動了。

六、分化不成，釀造禍端

山東境內武裝團體適應環境的方式各異，而且變化無常。這些團體組成分子複雜，組織方式不同，抗金附宋的背景也不一樣，而且各具實力，因此，不僅出現群雄並起，各自為政的情形；同時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求生存與發展，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式。其中，固然有民族意識強烈，如彭義斌者，但更多的人則以求生存為先務，他們輾轉南下的目的是避禍就食，其情形誠如程秘所說：「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飢饉，及畏敵人殺戮，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⁸³ 生活的資源與利益的取得，既是他們考量的首要因素，因此很容易因宋、金、蒙三國招撫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其初衷，出現游移取利，首鼠兩端的現象。宋金戰爭爆發後，宋對北人採取積極招撫政策，北人相繼南下，他們「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群；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⁸⁴ 要求日多，逐漸成為南宋政治、經濟上的難題。另一方面，鑒於金蒙相繼招安各武裝力量，安撫民心，宋廷又擔心金蒙政策的改變，會削弱義軍歸宋之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這些忠義人，使其充分發揮「供我驅馳」，並避免引發負面的影響，是宋廷與宋臣相當關切的議題。

宋人擔心山東忠義人聲勢浩大難以控制，因此許多大臣主張對他們採取以主制客、眾建與分散的政策。嘉定十一年大批北人南歸時，余嶸曾預料義軍難制，建議以勁兵控馭。⁸⁵ 葉適曾批評宋廷因循苟且，不敢分散忠義軍，使他們得以聚集為亂，將招大禍。方信孺認為「奸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建議「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⁸⁶ 徐鳳在嘉定十二年，奏論山東義軍的時事，也建議仿照賈誼眾諸侯之策，散置部落，分化他們的勢力，如此一來，不致因黨羽聚集而產生覬覦之心。⁸⁷ 曹彥

83 《洛水集》，卷2 輪對劄子，頁23上、下。

84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16 直前奏事劄子二，頁150。

85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5 龍學余尚書神道碑，頁12上。

86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66 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頁12上、下。

87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6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頁14。

約則指出「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⁸⁸ 京東河北節制司幹辦公事陳韡在嘉定十四年，向賈涉獻處置忠義人的策略時，也主張在新復的山東、河北各地，仿倣漢趙充國留屯之策，而且分授疆域給忠義人，如在山東採「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權」，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度，一州者守其土」。⁸⁹ 這些意見不僅反映南方士大夫、官僚對北人的疑懼，在態度上也趨向於消極性的思患預防。而宋廷在衡酌形勢變化與義軍的本質後，接納宋臣的意見，並透過第一線的邊閫執行。

賈涉是執行淮東防務的宋朝最高官員，面對人多勢眾、各自為政、背景各異的山東忠義軍，採取消極防禦重於積極鼓勵的態度。他鑒於正規軍不足，不敢明顯的採取以正規軍壓制忠義軍的方案；但為掌控情勢，保持主動，一方面以糧餉作為控制的手段，一方面則採行分化的策略。

糧餉的取得是山東忠義軍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憑藉，也是宋廷掌控忠義軍的重要資源。當宋廷設置忠義軍，發放糧錢一萬五千人時，李全即「起羨心」。⁹⁰ 此後，宋廷不斷賞賜錢糧，招徠忠義，但人數驟增，卻形成財政的重大負擔。楚州通判梁丙，想以減省錢糧作為控制忠義人數的手段，卻激起石珪據楚州南渡門叛變，造成忠義人對宋廷離心。賈涉在平息這場亂事之後，除了鼓勵忠義人北上從事恢復大業外，更藉糧餉作為攏絡與控制的手段。⁹¹ 如嘉定十二年一月，李全南歸後，宋廷賜予李全金帶一條、銀五千兩、絹一萬匹。⁹² 李全勸降張林，宋廷增放二萬人錢糧的措施，或也與賈涉的建議有關。十三年，石珪叛宋歸蒙的意圖明朗時，有人建議賈涉「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眾心一散，珪黨自離」，以此肢解石珪的部眾，但沒

88 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卷 61 治道，總頁 854。

89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46 忠肅陳觀文神道碑，頁 2 上。本節所引資料出於拙著，《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第 4 章，頁 215-223。

90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19。

91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8。

92 《宋會要輯稿》，兵，20之22。

有成功，反而迫使石珪降蒙。⁹³十四年正月，又賜緡錢六萬給李全。⁹⁴這種以提高錢糧作為利用義軍的籌碼，顯然與賈涉認知的「饑則噬人，飽則用命」的想法有關。⁹⁵

但這樣的做法，卻招致廷臣的許多批評。劉克莊在嘉定十三年就曾感慨的說：「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萬斛，其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⁹⁶葉適也指出「六七年間，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⁹⁷可見以錢糧為手段，雖然對穩定政局，乃至恢復疆土略有成效，卻形成宋廷財政的巨大負擔，並且逐漸養大忠義人藉機要餉的胃口。李全後來勢力壯大，欲圖割據時，還一方面對宋表示恭順以爭取糧食，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金朝的支持。金臣白華說：「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供給糧餉，特一猾寇耳。」⁹⁸都顯示宋廷以錢糧為誘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面對動機各異、勢力龐雜的山東武裝力量，宋廷的政策難以一致。在南渡門之變的過程中，梁丙曾調集其他忠義軍王顯、高友、趙邦永等人攻擊石珪，但他們相會時，卻是「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導致事變擴大。這一事件，使宋人和朝廷進一步體悟到忠義人若凝聚起來，對宋朝會是新的威脅。賈涉更深切瞭解此一情勢的嚴重性，因此在亂後，著手推動忠義人分屯的制度，分散其勢力，並增加正規軍的人數，來維持官方的主控權。《宋史》賈涉傳指出「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只是，隨著北人不斷南下，要常保正規軍的優勢並不容易。因此，當金兵進犯淮西之時，賈涉

93 《宋史》，卷476 李全傳，頁13822。

94 《宋史》，卷40 寧宗本記，頁776。

95 《宋史》，卷407 賈涉傳，頁12207。

96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28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書，頁7上。

97 葉適，《葉適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影印點校本，1964），水心別集，卷16 後總，頁845。

98 《金史》，卷114 白華傳，頁2504。

就利用忠義人彼此互不相屬、各自獨立、對經濟資源的依賴等弱點，分批派遣忠義軍去解除滁州與濠州之圍，而由正規軍隨行督視；⁹⁹ 進而施行一連串分化挑撥的手段，讓忠義軍之間，製造衝突，以便從中掌控。嘉定十三年，忠義領袖季先死後，賈涉即命統制陳選至漣水，統領其軍，此舉引起季先餘黨的抗拒，他們暗中迎接石珪到盱眙，奉為統帥。涉既無法直接統領該部，乃謀利用「眾建」的策略，將石珪的部眾分為六，由季先的部將分別統率。但是，此一分化計畫仍被忠義人所識破，諸將依然只聽從石珪的號令，以致造成「其後有（朝廷）教令皆不納」的窘狀。賈涉不得已，轉而利用李全來對付石珪，珪因而投向蒙古。¹⁰⁰

賈涉以錢糧與分化等手段，來掌控忠義人的計畫，卻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以及李全聲勢的坐大，逐漸帶來反效果。李全運用智謀與機運，不斷壯大聲勢；他以發動北伐及勸說義軍領袖歸宋的方式，獲得官職與糧餉，尤其在嘉定十二年渦口獲捷之後，更有擴大勢力的想法。於是，李全開始藉制置使的力量，打擊任何有礙他發展的義軍領袖；而這樣的想法，與賈涉所推動的分化政策正相符合。第一步是譖害威望跟他不相上下的季先；接著請求賈涉討伐石珪，此議雖未被接受，卻趁機佔有季先原有的三千軍額，領有餘眾，並由朝廷任命他的部將劉全為總管，分千兵駐於揚州，將其勢力擴至江北；進而建造船隻，「謀爭舟楫之利」，向南發展。¹⁰¹ 十四年二月，李全受命援救淮西，當金兵北撤時，他為了保全實力，竟「追之不甚力」。顯然李全遇機運用謀略，表面上配合賈涉的分化政策，實際上遂行擴張勢力的意圖，壯大聲勢以操控時局。

於是，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遂形成淮東防務的新威脅。當李全圖謀發展的時候，賈涉為了強化楚州戰力，及官方在前線的主導性，將原駐屯於鎮江的八千正規軍移至楚州城中，由翟朝宗統領；另分帳前忠義人萬人，由趙邦友、高友率五千人屯於城西，王暉與于潭領五千人屯於淮陰。李全人多，並不擔心鎮江兵的軍力威脅，只是厚結其將領，以避免成為心腹之患而已，他最擔心的是勇武善戰的帳前忠義。為了拉攏這些將領，李全曾多次稱

99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8-12209。

100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2。

101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2。

讚高友等人勇武，並為表示看重，請求賈涉允許他於出戰時率領這批軍隊，未被接受。從這些事例，顯示賈涉對李全的意圖有所瞭解，並採取對策。

不過，此時賈涉與宋廷決策者對待李全的態度與政策，差距日大。李全的勢力日大，圖謀發展的野心日熾時，丞相史彌遠卻為穩定時局，維繫朝廷與忠義軍的關係，反而利用種種名義厚賞李全，如嘉定十四年，宋廷欲藉翟朝宗與趙拱獻玉璽歸朝而大行慶賞之禮時，晉封李全為承宣使。¹⁰² 賈涉曾極力反對宋廷藉加官進爵、厚予獎賞的方式來攏絡李全。他說：「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並指李全「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¹⁰³ 但這些意見，並不為史彌遠所接受，顯示宋廷厚待李全的政策，與賈涉處處提防、圖謀分化以利控制的計畫，落差日益擴大。這種情況不僅顯露出李全積極擴大勢力的野心，也說明賈涉意欲執行的策略更加左支右絀、窘狀百出。

從嘉定十五年，賈涉與李全、益都張林三角關係的發展，可以看出賈涉疲於應付的窘境。張林雖因李全的勸說，舉青、莒諸州歸宋，但本人仍在山東的膠西等沿海一帶活動，坐擁鹽場之利。李全為壯大割據的基地，由其兄李福經營山東；李福看重張林轄地的鹽場厚利，百般威迫張林交出鹽場。張林向制置使賈涉申訴，涉密召其部下瞭解實情，卻被李福伏兵刺探，迫使張林投向蒙古。張林投歸蒙古後，仍致書賈涉陳述投蒙出於李全的脅迫，非其本意；涉心咎李全。李全進一步請求朝廷准他提兵攻張林，賈涉左右為難，暗中派人到山東宣勞張林，使人在途中又為李全所殺；李全急攻張林，入據青州，擁有山東之地，實力大增。¹⁰⁴ 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賈涉防患李全及謀拉攏張林以分化忠義的用心，而李全運用智謀、時機來壯大聲勢的用意也十分明顯。如此一來，不但賈涉與李全的心結已深，李全的勢力也發展到了遠非賈涉所能控制的態勢。

嘉定十六年，賈涉已無力處理李全勢力，窘境顯露無遺。當年二月，賈

102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3。又 賈涉傳 作節度使，誤。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頁 81，註 49。

103 《宋史》，卷 403 賈涉傳，頁 12209。

104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4。

涉出郊行勸農儀式，在返回楚州城的途中，李全的部屬攔路威迫，涉派人請李全的妻子楊妙真協助才打開通路。楊氏雖然在表面上怒責忠義軍，但李全部屬的脅迫行動，給多年來積極推動淮東邊防及流民政策的賈涉一個致命的打擊。此時，曾任知隨州、荊鄂都統制的許國奉祠在家，他一直想取代賈涉的職位；看到李全勢力坐大，他不斷向宋廷上奏疏，力陳「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¹⁰⁵明指李全意圖謀反。這些話，幾乎是從另一個角度否定賈涉多年來苦心經營忠義軍的努力，對賈涉自是另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內外交逼的情況下，賈涉身心俱疲、疾病發作，於是緊急向朝廷請辭制置使等職；獲旨回都奏報，其職由淮東制置司參議兼楚州通判陳鞏代理。¹⁰⁶不過，人未到臨安，病情已加劇，乞請休致；宋廷遷之為顯謨閣學士，通奉大夫。六月一日，死於臨安府黃鶴山寶慶院。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享年四十六歲。¹⁰⁷

七、結 論

賈涉崛起於南宋非常時期，無顯赫的家世，未取得功名，在朝又無奧援，這樣的人物在宋代承平時期的難以獲致高位的；而他卻得以開闢淮東、節制忠義，成為執行宋廷邊防政策的重要人物，這和他在宋金蒙三國勢力交錯、興替時期，以靈活的手腕處理邊防、流民及涉外事務，表現卓越有密切關係。

賈涉的成功，在於他能掌握時勢適切執行宋廷的政策鞏固邊防。他以靈活的手腕，妥善接納、處理大量山東忠義軍的南歸，且能反映執政者和輿論的主流意見，利用這批武裝力量作為恢復故土和救援危急地區的任務；使得山東地區在形式上納入宋的版圖，也使宋金衝突以來，淮東地區較少受到戰火波及。此外，他也善於觀察時勢，呼應朝廷的外交政策，是第一位推動聯

105 《宋史》，卷 476 李全傳，頁 13824。劉克莊在陳鞏的墓志中則說許國與涉有宿憾，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46，頁 3 上。

106 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46，頁 2 下-3 上。

107 見 賈涉墓志，頁 29。賈涉娶史氏，先涉十三年死，有子四人，長子貫之承奉郎，次子似道年僅十一歲，餘子尚幼，女二人，均未嫁。

結蒙古活動的宋朝地方官。此舉不僅有助於宋蒙兩國的相互瞭解，也化解山東忠義叛降問題所造成的誤會。這些都是他得以在變幻不定的大時代中出人頭地、晉昇高位，並且列名國史的重要原因，正如墓志所云：「若夫制閫勳業，則有國史在。」可見他是以自身的能力獲致勳名，而非受其次子賈似道位居權要的影響所致。¹⁰⁸《宋史》本傳的論贊也說：「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¹⁰⁹顯示《宋史》的編纂者相當肯定賈涉的才能，反而對賈似道累其聲名，表示遺憾。

對山東忠義軍的處置方式，是賈涉成敗的關鍵。他對忠義人的功利取向非常清楚，因此採取了利誘和分化的手段。這二種方式，在初期由於忠義軍人數尚少，他的文人身分也能得到北人的尊敬，¹¹⁰以及處置的策略受到輿論的支持，因此不論推動救援或恢復，都頗能得心應手，不僅成就了他的事業，也使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成為屏障宋廷的主要武力之一。

不過，隨著李全勢力坐大之後，賈涉的窘態就逐漸顯露。李全是一位精明狡猾、詭計百出、威迫欺瞞的豪強，當勢力壯大之後，興起裂土割據之心，驕縱與桀驁不馴的霸性益加明顯。賈涉雖然想設法壓抑、防範，卻招架不住、窮於應付；況且，此一想法又與丞相史彌遠一意拉攏李全、不斷授以高官的作法相違，最後竟到心力俱疲、疾病纏身而死。墓志說：「漸復故疆而不遂大業，致身法從而不及侍清光」，¹¹¹一方面寫出賈涉中壽而死，壯志未酬的悲情，另也顯示他處於風雲變幻的時期，難以掌握時勢的鬱鬱困境。然而相較於後繼者，如許國、徐晞稷等人，使用更為拙劣與極端的手法，以致激起李全的叛變而言，賈涉在處理山東忠義軍的手段，顯然是更勝一籌了。

108 賈涉於理宗寶祐二年（1254），被謚為「忠肅」，顯然與其子似道有關，但他死時，似道才十一歲，則與他被列入國史的因素，關係不大。

109 《宋史》，卷403 賈涉傳，頁12216。

110 《宋史》，卷476 李全傳 說李全見許國後，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頁13825。

111 賈涉墓志，頁29。

On the Achievements of Jia She: Focusing on the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Huai-dong Region in the Mid Southern Song

Kuan-chung Huang^{*}

Abstract

The inclusion of Jia She's 賈涉 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is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his son, Jia Sidao 賈似道. This essay, however, argues that Jia She's inclusion should be credited to his successful handling of border defense, refugee problems and foreign affairs during the turbulent era of the competing Song, Jin and Mongol regimes. By the timely application of Song court policies he consolidated the border regions and recruited the loyalist armies of Shandong, turning them into a major irredentist and emergency force. He also advocated alliance with the Mongols at opportune moments. It was due to his successes that he stood out and managed to flourish even at such an era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yalist armies and the rise to power of Li Quan 李全 had a great impact on Jia She's career. Jia She had at first employed the tactics of monetary enticement and discord to smoothly manage the loyalist armies. However, with the growth of Li Quan's power and his separatist ambitions, Jia She was unable to counteract and finally exhausted his resources. Clearly, as Jia She's policies lacked court recognition and sufficient support, he

* Kuan-chung Huang is a Research Fellow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was no longer able to cope with the urgencies of the situation.

Jia She's career is the focus of five main sections of this essay. In addition to reassessing and supplementing biographical dat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his historical role by contextualizing Jia She in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of the Southern Song. We will thereby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of socio-political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in 12th century China.

Keywords: Jia She 賈涉, Commissioner of Huai-dong 淮東制置使, loyalist armies, Li Quan 李全, Southern Song history